

塞罕坝精神：生态文明建设的绿色丰碑

□ 刘春延

2017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塞罕坝林场建设者感人事迹作出重要指示指出：55年来，河北塞罕坝林场的建设者们听从党的召唤，在“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的荒漠沙地上艰苦奋斗、甘于奉献，创造了荒原变林海的人间奇迹，用实际行动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铸就了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绿色发展的塞罕坝精神。2021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塞罕坝机械林场考察时强调：塞罕坝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组成部分，全党全国人民要发扬这种精神，把绿色经济和生态文明建设好。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充分肯定了塞罕坝林场建设的历史性成就，明确了塞罕坝精神的科学内涵，深刻揭示了塞罕坝精神在推进生态文明进程中的重要意义，为新征程上学习、弘扬、践行塞罕坝精神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塞罕坝精神贯穿中国人民绿化祖国的伟大实践，深植中国共产党生态建设的宏大征程。新中国成立之初，共产党人调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其中，1962年毅然作出建设塞罕坝机械林场的决策，组建了以王尚海为党委书记的坚强领导班子，汇集了以大专毕业生为主力的369人创业大军。建场前两年，造林均以失败告终，创业之初遭遇惨烈的“下马风”。领导班子以逆势而上的决心“举家上坝”，开展“马蹄坑造林大会战”，并取得成功，由此塞罕坝进入了大规模造林快车道。与此同时，塞罕坝开展科技攻坚，探索出全光育苗法、成功引种樟子松、改进植苗机械等技术。塞罕坝人凭着超凡意志和勤劳

双手，以迎难而上的勇气和实干兴场的定力顽强应对，20年内投资2084万元，造林106万亩，造林成效被原林业部评价为“两高一低”，即造林成活率高、保存率高、造林成本低。同时，通过科学制定森林经营方案，及时建立和实施森林经营技术规程和标准，累计实施人工林抚育面积300多万亩，森林蓄积量由33万立方米猛增至1037万立方米，塞罕坝的生态成果和示范效应不断显现。进入“二次创业”新征程，塞罕坝林场坚持绿色发展理念，2017—2022年石质阳坡累计造林10.36万亩，石质荒山全部实现绿化，森林管护更加严格，保持着建场以来从未发生森林火灾的好成绩，始终将林业有害生物成灾率控制在3%以下。2021年新中国成立72周年之际，塞罕坝精神成为党中央批准的第一批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伟大精神之一。

塞罕坝的这一生态巨变生动展示了中华民族精神在生态领域呈现出的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绿色发展的深刻内涵。塞罕坝精神是生态文明建设成就的生动范例，为中国共产党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撑。

“牢记使命”是塞罕坝精神的高尚灵魂。塞罕坝人始终坚定忠诚于党和国家，始终坚定履行使命职责，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1964年，承德二中6名不满19岁的应届高中女毕业生，毅然放弃报考大学的机会，主动请缨奔赴条件艰苦的塞罕坝，投身到荒漠造林的艰苦事业中。从倒大粪到选苗，再到上山植树，这几个来自城市的女孩子，克服恶劣的气候和高强度

劳动对女性身体的挑战，将青春和热血奉献给了这片土地。“六女上坝”是老一辈塞罕坝人胸怀远大理想和坚定信念建设塞罕坝的典型代表，诠释了塞罕坝人牢记使命、为国奉献的坚定信念。一批批信念坚、政治强、本领高、作风硬的党员先锋，以身作则，凝聚一心，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生态建设方针，岁岁躬耕终赢得青山不负，如今的塞罕坝森林覆盖率达11%跃升至82%，有林地面积115万亩，成功锁住风沙南侵咽喉，走出了一条生态系统从零基础到高质量的重塑之路。

“艰苦创业”是塞罕坝精神的鲜明特质。特殊时代背景和恶劣环境共同催生出艰苦创业的行动自觉，成为塞罕坝精神的鲜明特质。这里曾是全国知识分子最为集中的林场，1962年就有127名大中专生，由于条件艰苦，他们的下一代失去了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截至20世纪80年代初，林场职工子女没有一个考上大学。当年上坝的那批大学生平均寿命不到52岁，相比坝下人少了15岁，青壮年的死亡率比坝下人高28%。时任林场技术副场长的张启恩当年为稳定人心，将妻子和三个孩子的户口从北京迁至坝上，后来不仅他自己落下了终身残疾，三个孩子也都没有受到良好教育。艰苦创业的内涵不仅体现在“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的无私奉献，也体现在精益求精的科学探索，他们攻克高寒育苗、机械造林等难题，开创了“三锹半人工缝隙植苗法”等核心技术，几年内树苗存活率从8%提升至90%以上。这种精神不仅赋予生态建设者敏锐的洞察力和高效的执

行力，更以科学探索的执着精神与艰苦创业的坚韧品格，为生态建设事业注入了持久的发展活力和内生动力。

“绿色发展”是塞罕坝精神的价值追求。塞罕坝百万亩林海支撑着生态系统的稳定运行与生态服务功能的有效发挥，始终坚持“向绿色要发展、向绿色要未来”的发展思路，从单一林业产业到多业并举，有效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擘画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效益蓝图。塞罕坝林木采伐量仅为生长量的20%，实现了越采越多、越采越好，带动发展生态旅游、林下经济、苗木培育和绿化工程绿色产业。林场每年经济收入由建场之初的不足10万元增加到1.6亿元，带动周边4万多名百姓受益，2.2万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每年实现社会总收入6亿多元，为当地4000余名群众提供就业机会，2021年获得“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荣誉称号。2017年塞罕坝机械林场获得联合国环保最高荣誉“地球卫士奖”，2021年又获得联合国防治荒漠化领域最高荣誉“土地生命奖”，更加印证了塞罕坝绿色发展的国际影响力。从昔日荒原变成华北地区的“绿宝石”“聚宝盆”，塞罕坝证明了党和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决策部署和绿色发展道路的科学性与前瞻性，为启发全社会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作出良好表率。

（作者系国家林草局管理干部学院党委书记、国家林草局党校副校长）

精神丰碑

延安时期，先后有英、美、苏等10多个国家600多位外国人到延安及陕甘宁边区访问或工作，他们中有记者、医生、军事顾问等。在延安，他们大都有一种进入“光明之地”的感觉，接触了一支“神奇的队伍”，发现了一个可以寄托灵魂的事业，尤其看到了一种不同于“西安作风”的全新作风——“延安作风”，从此折服于这种作风并成为拥有这种作风的中国共产党的“热心捍卫者”。经过他们手中的笔，这种新作风风靡全中国、传向全世界，一个独具特色的理想至上、艰苦朴素、一心为民、追求真理和清正廉洁的中共形象在国内外传播并树立起来。正是在对“延安作风”和“西安作风”的比较中，外国友人了解了“即将掌握中国命运的人”，感受到了人心向背，“看到了中国的未来”，得出一个全新的结论——“共产党正在得到中国人民的支持”。

空气中充满理想至上的气息

中共落脚陕北后，面对国民党铜墙铁壁一样严密的新闻封锁、诬蔑歪曲宣传，为了弄清楚“中国共产党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到底“是不是‘纯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等问题，一些外国人克服重重困难，通过各种渠道进入红色中国一探究竟。他们发现，中国共产党实际上是一群有着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的人，延安的空气中充满理想至上的气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从北平一路辗转来到革命圣地延安，写下了著名的《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一书，向世人展示了共产党人坚定的理想信念、崇高的奋斗目标和简朴的生活作风，使西方人第一次真实地看到了中共形象。在斯诺采访中共领袖毛泽东时，毛泽东表示，“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斯诺发现，受中国共产党人的影响，全国青年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特征都很明显，“社会主义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中国未来的社会形式”。美军观察组成员约翰·高林在延安生活体验后，认为延安强调理想至上，人们在空气中可以嗅到这种气息，他们的衣服破烂不堪，他们的装备缺少子弹，但他们有为目标奋斗的精神。

以简朴奋斗之风为荣

外国友人看到的延安，与国统区和国民党官员的奢华形成鲜明对比，“没有奢侈豪华的东西，也很少舒适安逸的生活”，共产党人生活上的简朴形象和工作上的奋发精神令其印象深刻。1936年，斯诺采访时看到，“毛泽东的生活和红军一般战士没有什么两样。做了十年红军领袖，千百次的没收了地主、官僚和地主的财产，他所有的财物却依然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物——包括两套布制服”。同样，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财政部部长林伯渠的眼镜，腿架已经断了，用一根绳子系在耳朵上；彭德怀的一件衣服，是用长征途中击落敌机后缴获的降落伞做的背心；等等。1937年，海伦·斯诺访问延安后总结，在延安，“一个人在社会上的成功与否，在于他能否尽可能降低自己的生活标准同时尽可能提高自己的工作效率”。1944年，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在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强调，延安的共产党人衣着和生活都很简朴，几乎每个人都穿同样普通的、用土布缝制的中山装。包瑞德也承认，“在吃苦耐劳方面，共产党军队超过美军是很显然的”。他们制作的反映延安生活的纪录片中专门写了这样一段话，“他们最大的魅力就是简朴。他们的目标是勤奋工作和简单生活，而他们的精力、活力和真诚使他们与腐化的国民党形成鲜明的对比”。

“和人民打成一片”

外国友人看到，共产党员时时刻刻都在群众中发挥作用，同时又十分注重依靠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在外国友人眼中，“群众”和“人民”是中国共产党人话语中的高频词，反映出共产党人“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斯诺发现，虽然南京方面出价25万元悬赏毛泽东的首级，毛泽东却放心随意地走在延安的大街上。相反，蒋介石到西安时，城门口的所在道路布满了宪兵和军队的岗哨，沿路的农民都被赶出了家，两者形成了鲜明对比。海伦说，她懂得了共产党能够组织人民——不是向他们提供物质的东西，而是依靠亲密无间的精神力量，即与人民生死与共。斯坦因在延安实地采访时发现，中共要求党员和人民群众紧密合作，真正践行“群众观点”。他认为，共产党在军事及其他政策方面之所以能取得成功，主要是靠“和人民打成一片”。谢伟思在给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报告中这样描述：官员和人民与我们的关

外国友人眼中的延安作风

□ 王亚妮

系，以及中国人之间的关系，都是坦诚、直率和友好的，“这里到处都强调民主和同老百姓的鱼水关系”。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认为，共产党最根本的出发点是中国人民的利益，箴言是“到群众中去”“向群众学习”。

主动寻求批评和开展自我批评

共产党人严格自律、主动寻求批评和勇于自我批评的风范也给外国友人留下深刻印象，并写进外国友人的作品中。斯诺在《红党与西北》一文中指出，在各种环境下自己单独和一些工人或士兵谈话，他们都可以自由地批评政府。福尔曼在参观延安医学院时，了解到学生们每天必须纺3小时纱或做其他的生产工作，便向校方提出，让医学院学生每天纺纱3小时“完全是浪费而没有效率的”。不久，延安举行的一次医学会议讨论这个建议后，就取消了学生们每天3小时的劳动。他说，这证明他们接受了批评！美国《时代》周刊驻远东首席记者白修德了解了共产党的思想、政治、经济政策和民主建设等方面情况后，对延安的清新气象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他发现，延安方面认为批评是一种有效的民主，共产党人经常进行自我检讨，总是用放大镜检验自己的过失，并不断进行自我改进。他认为，共产党“行政上的批评自由形成了中国农民所未有过的最民主的政治制度”。

崇尚清正廉洁的风范

全面抗战爆发后，大批外国友人来到陕甘宁边区，共产党人的优良作风给他们留下极佳印象，他们觉得特别值得一提的共产党人的廉洁奉公。面对共产党毫不留情地清除贪污腐败，差不多所有来访的外国人都认为，“那里极端廉洁的政府实行了激烈的、勇敢的、广泛的政治、经济、社会改革”，形成“廉洁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的共识。斯坦因认为，共产党在行政方面最大的成就是消灭贪污，政府完全是廉洁的。美国银行家马特爾·霍尔想要揭露共产党的丑闻，但连一个反面事例也没找到，看到人民吃穿很好且正在以高度的爱国主义热忱努力打败敌人，边区政府是他在中国见到的“最近乎民主的政府”。法国人乔治·乌尔曼把陕甘宁边区称为“五无的领域”，即“无乞丐、无鸦片、无卖淫、无贪污和无苛捐杂税”。在福尔曼的《红色中国报道》一书中可以看到这样的内容，共产党改造了过去时代腐败的政治机构，使边区各级政府真正成为全民族需要的、抗日的、廉洁的政府，客观地展示了边区政府卓有成效的廉政建设成果。

（作者系中国延安干部学院人力资源部副主任、二级巡视员）

学史明理

全面抗战时期党领导的人民军工

□ 宋庆伟

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武器弹药等都几乎无外援可依赖，科技短板制约了人民军工的发展。为此，党增加了对军工的人力、物力投入，实现了枪械技术、冶金技术和化学技术的发展，开启了人民军工批量生产的全新征程，为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军工科技发展的动因

游击战争的军火接济是一个极重要问题。对人民军队而言，抗战之初其“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枪械和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弹药是从敌军那里夺来的”，数量不多且五花八门，弹药也难以补给。1937年8月10日，毛泽东在给中共驻旅山西代表彭雪枫的电报中坦言：红军的技术和装备是十分贫弱的，没有相应的装备补充，同强敌作战是难以收效的。随着兵员的迅速扩大，1940年时八路军只有三成枪，且有80%的枪“来复线已磨平，口径已松，射击已失效”，根本不能作战，弹药也严重不足。朱德、彭德怀于1940年1月向各兵团发电：子弹缺乏成为我军抗战中十分严重的困难。中央军委在1941年11月指出：国民党已两年未发一颗子弹，“与日寇作战，弹药消耗很大，而缴获则较少（这与国内战争大不相同）”，要求各部应扩大军工生产，提高军工技术，以满足作战需要。

然而，此时人民军工因缺乏科学技术，仍以修理枪械、手工造枪、复装子弹为主。如1939年晋豫支队修械所手工造出步枪10支、冲锋枪2支，但尺寸不统一，零件不能互换，连射四五十发后枪管发

军工科技的发展与应用

枪械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枪械是全面抗战初期人民军工的生产重点，中央军委多次强调“加强扩枪，因有枪就是兵”。人民军工结合我军游击、近战等特点，取长补短，设计了“八一式”步马枪，枪身短小、轻便，射击精准，连射100余发子弹，枪管不红。据时任八路军总部军工部部长刘鼎回忆，他扛此枪到总部汇报时，在场的徐向前背着此枪不肯放下，并说：我当兵能背这种枪，不吃饭也高兴。人民军工还对日军50mm小炮进行了改制，增加了底座和炮腿，延长了炮筒，配备了扇形标尺，最大射程可达1000米。此后，人民军工还将此炮由曲射改为平射，“摧毁敌人的碉堡就容易了，敌人大吃一惊”。根据这一原理，人民军工还试制了60mm、75mm、82mm等口径迫击炮，为敌后抗战增加了重武器。

冶金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因小高炉冶炼的白生铁不能切削加工，毕业于柏林工业大学冶金专业的陆达突破了炮弹壳烟火技术，使白生铁在950℃高温下，析出碳元素，从而降低其硬度，并可切削加工。陆达还编写了《炮弹壳烟火实验总

结》，分发至其他根据地，推动了此项技术的普及。炮弹壳烟火技术大幅提升了炮弹、手榴弹、地雷等产量，“使敌人到处因我们的手榴弹、地雷、土枪、土炮而疲于奔命”。此外，1942年毕业于北洋大学冶金专业的孙艳青利用民间收集的铜元提取了纯铜和纯锌，并按三铈七铜的比例熔制了“三七黄铜”，生产了第一批全新子弹。经测量，这批全新子弹的初速度、膛压、飞行状态等各项指标合格，且与日本的子弹威力相当，仅晋察冀根据地即可年产全新子弹80万发。随后，此技术在其他根据地进行了全面推广。

化学技术的发展与应用。1940年晋察冀根据地技术研究室张方、黄锡川等人利用仿铅室的大水缸，试制了硫酸和硝酸，而后将硫酸、硝酸与脱脂棉混合制成了硝化棉。硝化甘油，则是硝化棉与肥皂中提取的甘油混合而成的，是高级炸药的重要原料。经测试，以硝化棉和硝化甘油为主要成分的发射药，每加一包（5g），可使82mm迫击炮弹的射程增加300—400米，最大射程可增加至1550米。此外，高级炸药还极大提升了手榴弹和炮弹的爆破碎片数量。经测试，25g高级炸药装填的手榴弹，爆破碎片为202片；145g高级炸药装填的82mm迫击炮弹，爆破碎片为234片。

军工科技发展的经验

一是中国共产党对军工科技的高度重视与全面领导。据统计，全面抗战时期以毛泽东和中央名义专门讨论军工科技的指示电报有7封。在讨论全局问题时，提及军事工业和军工科技的电报多达10余